

Walter Scheidel  
沃特·席代爾  
黃煜文◎譯

# 大逃離

ESCAPE  
FROM  
ROMA

羅馬帝國滅亡如何開啟  
現代經濟大分流

THE FAILURE OF EMPIRE  
AND THE ROAD TO PROSPERITY

導讀

## 羅馬不倒，歐洲不會好！

林明仁（臺大經濟系特聘教授）、  
鄭紹鈺（臺大經研所碩士暨研究助理）

如果埃及豔后克麗奧佩脫拉的鼻子再短一點，世界的面貌將會大為不同。

——法國數學家巴斯卡（Blaise Pascal）

### 「如果……，歷史會如何改寫？」羅馬史開啟的反事實思考

「羅馬的文化遺產如何影響歐洲？」這是個大哉問。早期的歷史書籍在處理類似議題時，往往會先描繪羅馬時代發生的大小事件與當時的社會條件，再談帝王將相的奇聞軼事，加上一些太史公式的點評（敘事史學），或是強調史料考證與真偽判別的重要性（實證史學）。晚近的作品則開始借用社會科學理論，分析歷史事件如何塑造現代的歐洲文明，以及事件背後的各種機制（新史學）。讀者在閱讀這類歷史著作時，很有可能不自覺地在心中萌生一個念頭：「現代歐洲發展得這麼好，應該跟羅馬帝國遺留的傳統有關吧？」在尚未仔細檢討羅馬遺產如何影響今日的發展之前，這個念頭，正如蘇格蘭思想家大

衛·休謨 (David Hume) 的名言「它在那之後而來，故必然是從此而來」(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 所述般，其實是犯了因果關係的「後此謬誤」。

從嚴格的社會科學標準來說，試圖驗證「羅馬遺產影響了現代歐洲」這個假說，往往會在因果關係的確立上面臨很多挑戰。首先，經過了本次的 Covid-19 疫情與疫苗之亂後，大家都應該知道，實驗是確立因果關係的黃金準則。想知道疫苗是否可以阻止病毒蔓延？找一群人，隨機一半給疫苗，一半給安慰劑，一段時間後再看看感染機率是否不同。但如果讓人們自己決定要不要打疫苗，那結果可能就會有比較多的變數。因為比較小心謹慎或怕死的人同樣也比較有可能選擇打疫苗，這就導致即使打過疫苗的人感染機率較低，我們也難以確定這個結果究竟是疫苗本身的功勞，還是那些人小心避免接觸病毒的影響。

同理，想知道職業訓練是不是有效果？同樣找一群人，隨機一半給職業訓練，一半不給。為什麼隨機給予職業訓練很重要呢？假設不是隨機給予職訓，便有可能是本來就比較勤勞、積極的人，會自主選擇去參加職訓，而政府評估職訓成果時，便會混雜了「勤勞、積極」等個性本身的影響。但這些人就算不參加職業訓練，本來就可能更願意找新的工作，或是尋找其他管道自我進修，因此政府對於職訓的估計便會產生偏誤，這便是計量經濟學所謂的「自我選擇」問題 (self-selection)。但透過隨機給予職業訓練 (通常還要一些更精細的研究設計)，我們便可以檢驗出職業訓練的真實效果。

然而，不是每個假說都能這樣「輕易」地檢驗。舉例來說，想知道民主與非民主的差別，我們就無法請上帝之手伸進非洲，隨機給一半國家民主政體，一半獨裁，再觀察之後的變化。更遑論像羅馬帝國滅亡，或秦始皇統一六國這類不可重複的重大歷史事件了。除非我們製造出五十個平行時空，其中二十五個羅馬帝國繼續存在，二十五個沒有，再以某些模型加以模擬 (就像電玩遊戲《世紀帝國》)，

不然我們基本上無法以嚴格的標準來重建因果關係。

只是，「如果長平之戰趙國不是派出趙括而是廉頗」、「如果希特勒繼續在藝術領域發展而不從政」等這一類推演歷史可能性的心智活動，還是很令人著迷。一方面是滿足對各種歷史可能性的好奇心，另一方面，透過各種關鍵變項的重新設定，也更可以釐清不同因素在歷史上的重要性。這種針對某些可能發生或幾乎發生，但終究未發生的關鍵因素假設，就是所謂的「反事實推論」。用計量經濟學的語言來說，即是理解各項因素「究竟能夠解釋多少重要歷史事件的變異量」。

只不過，相當比例的史學研究者對反事實分析抱持著懷疑的態度。因為一旦讓歷史研究加入狂野的想像，可能會傷害史家的嚴謹形象，並危及歷史的客觀性。不過還是有一些重要的史家會一時手癢，做出這類假設性的自問自答。例如年鑑學派大師費爾南·布勞岱爾 (Fernand Braudel)，就曾在其著作《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中提問：

「讓我們暫時假設中國戎克船在一四一九年繞過了好望角，是否會讓這個巨大而遙遠的國家在征服世界上占據了優勢？」年鑑史家主張要同時從個體、社會與自然這三個短、中、長的時間維度來看歷史，也大量應用了社會科學的理論。一旦跳脫考證與一字不漏的記錄或描述，而是考慮各種不同時間軸變項對歷史發展的整體影響，那麼「假設式的反事實推論」就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了。讀者如果對這類稍嫌偏門的「史家的技藝」有興趣，前哈佛大學的明星史家尼爾·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主編的《反事實的思考》(Virtual History)，以及今年十月剛出版，由昆汀·德魯爾默 (Quentin Deluermoz) 與皮耶·森加拉維路 (Pierre Singarvelou) 兩位法國史家合著的《過去的可能》(A Past of Possibilities)，都是很好的讀本。

## 經濟學家對反事實思考的迴響

那我們經濟學家怎麼看？由於經濟學家早已內建因果推論的基因，所以大概是比較容易接受並大量使用反事實推論法來評估事件影響的一群人。舉例來說，一九九三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W. Fogel）的著作《鐵路與美國的經濟增長》（*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便探討「如果美國沒有興建鐵路，而是一直依靠水路運輸等方式交通，會對歷史造成什麼影響？」他以一八四〇年至一八九〇年的大量歷史數據為基礎，得出「鐵路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大」的結論。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內森·納恩（Nathan Nunn）曾發表過一篇文章〈非洲奴隸貿易的長期影響〉（*The Long Term Effects of Africa's Slave Trades*），藉由分析大量跨大西洋奴隸販運的資料來估計西方殖民和奴隸貿易的損害。非洲當時有許多黑奴其實是被自己的親朋好友與同族人拐賣，而這種「骨肉相殘」的經濟活動對非洲社會的信任基礎造成了很大的傷害（例如象牙海岸至今仍然是世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根據納恩的反事實推論，如果歷史上的奴隸販運出口量在非洲減少一個標準差，那麼非洲國家今天的經濟表現就會增加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說，二十一世紀初期象牙海岸的人均所得，會變成跟歐洲巴爾幹半島的塞爾維亞差不多！

由前述說明可知，反事實推理並非天馬行空，而是以已知事實為基礎，並參考大量的量化及質化的歷史素材，才能有足夠的可信度。反事實推理的方法，可以幫助研究者開闊思路、避免線性的歷史記述，還能突顯偶發事件的重要性以抗衡傳統的「歷史決定論」。引入反事實的思考，「以史為鑑」就能有更豐富的內涵。我們要強調的是，這類作品不僅是「重新想像歷史」，而是更仔細地結合史實分析與社會科學。藉由反事實分析的方法，我們能夠檢驗各項因素對歷史事件的影響力。若能善加利用，便能

成為歷史研究的新方向。就如同年鑑學派開創者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所期待的，歷史學將成為不同科學領域的綜合體，從氣象學到法理學，每一種學科都有其作用，而理想的史家同時也是多個技術領域的專家。

《大逃離》就是這樣思維下的產物。

### 《大逃離》的反事實思考：西方崛起的關鍵是羅馬帝國滅亡？

本書作者沃特·席代爾（Walter Scheidel）任教於史丹佛大學歷史系，是在羅馬經濟史與人口史皆成一家之言的當代大師。在羅馬史家當中，他也是「觸角甚廣」的那位，除了羅馬經濟發展與人口變遷，他的研究還包括羅馬時期的埃及、亞述，甚至是後來的東羅馬。席代爾善於利用新出土的古代研究，回答當代社會科學的重大問題：古代的国家形成是怎麼一回事？帝國的政治經濟是如何運作？他本身亦是《牛津羅馬史研究指南》（*The Oxford Handbook of Roman Studies*）□《牛津古代近東與地中海國家研究指南》（*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Stat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Mediterranean*）□《劍橋希臘羅馬世界經濟史》（*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Greco-Roman World*）等權威工具書的主編或共同編輯，其學術成就可見一斑。

作者近年來轉向綜觀數千年的「大歷史」研究，並對於比較中國跟西方帝國的發展產生了興趣，《大逃離》便是他的階段性成果。為何西方崛起、中國衰弱？對此，本書一反傳統「西方中心論」史學常見的論調（歐洲乃是希臘羅馬的承繼者所以才一枝獨秀），反倒認為正是因為歐洲逃離了羅馬，逃離了羅馬式大一統帝國，才得以率先大步邁向工業革命與現代經濟。如果羅馬不崩潰，歐洲反而沒有未

來。這樣的提問，正是扎扎实實的為本書立下了反事實分析的大旗。

本書認為工業革命所導致東、西方間的「大分流」，其實是歷史上的「第二次」大分流。第一次大分流則是指羅馬帝國的瓦解，因為歐洲從此再也沒有出現第二個大一統帝國。相較之下，中國秦崩而漢復，東漢末年雖天下三分、群雄並起，然歷經三世紀後又凝聚成一個隋唐帝國，唐滅宋起，宋亡元明清。羅貫中那句經典名言「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在歐洲並不成立。

席代爾先是利用統計數字，提出了歐洲是少數長期分裂、有多個政權並存的地方。換句話說，歐洲維持了長達千餘年的「戰國時代」，此現象在世界各地都未曾見過。本書認為「大一統帝國」（monopolistic empire）不利於發展出西歐在近代展現的經濟活力，其論證已於我們先前替衛城出版的《大分流》所寫的解說〈為什麼中國沒有資本主義？〉一文中多有觸及；舉凡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對於戰國爭鳴有利思想流通、趙鼎新認為明儒暗法的中華帝國體制不利於發展、西歐在政治上獨立的城市體制的重要性、加州學派對於中西經濟研究的修正等等，這些我們曾在該文中列舉的新研究，本書皆有提及。這些新研究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皆指向了歐洲長期「互相競爭的分裂狀態」（competitive fragmentation）的益處。而這也是本書最主要的立論基礎。

本書在寫作上可以區分為前半、後半兩大區塊。前半部分分析了「為何羅馬帝國可以統一歐洲」與「為何沒有第二個羅馬帝國」這兩個歷史問題。作者在這部分可謂別出心裁，除了引介羅馬經濟史、人口史的最新研究之外，還利用史學界較少著墨的「反事實推論」去進行思想實驗，探討羅馬在什麼情況下可能無法統一歐洲，以及羅馬之後的歐洲政權中誰最有機會可以統一歐洲。

在介紹羅馬崛起這塊，本書首先分析了羅馬統一歐洲的關鍵因素：人海戰術。羅馬早在共和時期便以低廉的財政成本動員龐大的兵力，其徵兵數相對於人口的比率，已經達到了歐洲在二次世界大戰時之憂，掌握了統一地中海的有利條件。

總動員的水準。換句話說，儘管羅馬有時並未在科技或戰爭技術上凌駕於敵國，卻總是能以人海戰術征服當時大部分的敵對政權。這樣的徵兵體制，有賴於以下這些歷史條件：一、羅馬有一套分配戰利品給國內與盟友的獎勵機制。二、打勝仗對於羅馬菁英豪族的職涯至關重要。三、羅馬共同體仰賴戰爭來維繫。在鄉下跟邊陲地帶，被徵兵是唯一能讓當地人感受到「羅馬是我的國家」的公共活動。

作者接著分析外交跟地理環境，古羅馬在這一點上可謂占盡天時地利。在早先希臘城邦與東方波斯帝國爭霸的時期，羅馬城位處偏遠，沒有被各大戰役掃到颱風尾。等到羅馬崛起之時，最大的敵人只剩下地中海的迦太基。儘管雙方旗鼓相當，但羅馬順利與當時控制東地中海的埃及打好關係，消除了後顧之憂，掌握了統一地中海的有利條件。

席代爾利用反事實推論進行了大量的思想實驗，發現日後幾乎沒有哪個政權有類似羅馬帝國的條件可以統一歐洲。日耳曼人建立的王國無法重新控制羅馬的稅收體系、東羅馬帝國皇帝難以收復全部江山、阿拉伯帝國無以團結各個地方軍政首領，就連橫掃世界的成吉思汗與兼併歐陸的拿破崙，都缺乏足夠的條件統一歐洲。舉例來說，拿破崙時代的戰爭人數規模雖然已經恢復到羅馬當時的盛況，但由於人均支出大幅上升，戰爭反倒變成了相當資本密集的活動。至於羅馬全盛時期的制海權，則要等到英國的納爾遜打造出龐大的海軍後才得以復見。

## 比較的視角：《大逃離》對大分流討論的回應

本書的後半部分，則是引用大量的二手研究來說明作者眼中的「大分流」。席代爾首先討論「羅馬帝國瓦解」對歐洲的好處，以及為何中國欠缺類似的條件。作者認為，羅馬帝國滅亡使西歐各個日耳曼

王國改採授地分封的封建制度，而這套將土地層層授予軍事菁英的方法改變了戰爭的形態，使各國不能再像羅馬一樣用低廉的成本徵召大量人力從軍。此外，由於授地分封取代了官僚徵稅，中央皇權的權力便開始由內而外裂解。隨著歐洲列國之間陷入長期的戰爭狀態，國家之內出現了「皇權內縮」的現象，這樣的空隙反倒提升了其他各個階級的能動性，國家大事的決策不再由皇帝一人壟斷。政治權力的破口，給了各個階級與國王互相牽制與談判的機會，結果便是王權無法百分百遂行其意志。例如商人等國內的其他階級，便有可能表達他們的偏好，一個相對包容廣納的政治經濟體制於焉形成。這個動態過程在《自由的窄廊》一書也有許多著墨，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對讀。

接著，席代爾花了大量篇幅描寫中國的發展。由於作者對中國史的理解遠不如羅馬史與歐洲史，所以相較於對歐洲的細膩書寫，對中國則往往採取鐵板一塊的解釋而稍嫌薄弱。但作者仍給出了三方面的解釋，分別是軍事財政、自然環境與文化，並據以與羅馬史相互印證。

首先在軍事財政上，與歐洲的財政跟戰爭型態不同，中國北方平原仰仗的是大規模的騎兵。讀者可以想像三國時代魏國的虎豹騎，除了對於曹操統一北方有巨大的貢獻，也被牢牢控制在曹家手上。財政上面，除了宋代是少數商業稅收占比較大的時期外，大部分朝代都依賴農業稅收跟徵用農民當苦役，這點跟歐洲諸小國依賴貿易稅收極為不同。這兩點皆都有利於形成一個穩定的官僚體系，來支持頭重腳輕的中央集權帝國，但對商業發展、思想的競爭與流通，則有不利的影響。

第二是自然環境的影響，作者在此引介了包含《中國西征》在內的許多內亞史研究，提出了「大草原效應」(the steppe effect)：因為要應付游牧民南下牧馬，中原地區較易形成大一統帝國。第三是文化的影響，作者除了提到秦始皇書同文，還引用了以色列學者尤銳·皮納斯(Yuri Pines)關於中國各家思想的研究，與西方做了一番比較。有趣的是，作者此處並未談到科舉對於維繫中國官僚與儒教的重

要性。在這一點上，韋伯早在一世紀前的《中國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China)等著作中就曾分析過中國的儒教與官僚體制，分析雖有錯漏，卻比本書作者深入許多。

最後，作者則側重討論歐洲在羅馬帝國滅亡後的長期分裂，對於近代的第二次大分流有什麼影響。作者極大量引用了趙鼎新、莫基爾、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詹姆斯·羅賓森(James Robinson)合著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等既有的大分流研究，利於對文獻不熟悉的讀者進入狀況。書中最有創新的部分，集中在第十章「制度」跟第十一章「新世界」，因為這兩章的論證比較少會在既有的經濟史研究上看到。

作者的結論比較隱晦一點，但讓我們嘗試直接幫作者說明白：那便是**逃離大一統帝國，反而讓歐洲變成世界上「帝國密度」最高的地區**。一個區域裡同時並存了許多帝國中心，這些中心又控制了許多海外殖民地，這些帝國彼此之間的海外競爭導致了重商主義，擴張了海外貿易的規模，進而演變成地理大發現。作者更指出，許多重商主義的政策有利於資本家階級，進而有利於經濟發展。如果歐洲是被一個大一統帝國統治，則資本家便無法影響國家政策，前述的海外競爭也不可能發生。

從比較分析的「單位」來看，作者不只談了作為獨立國家的英國，更從帝國的角度去談整個大英帝國對於英國工業革命的正面影響。作者並不諱言在歐洲經濟起飛的階段，許多政策的本質是重商主義而非自由貿易。他除了引用艾塞默魯與羅賓森的著作，也引用了不少伊曼紐爾·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可見作者試圖從整個「大英帝國」的角度去理解工業革命，而不只拘泥於「英國」(英格蘭)。換句話說，作者傾向全面地描寫當年位居日不落帝國中心的倫敦，而不只是傳統工業革命研究裡的曼徹斯特，此為工業革命的既有文獻裡較少見的觀點。

## 遺珠之憾：臺灣、中國、地理大發現與羅馬的貢獻

不過，本書在文獻處理上，難免有許多疏漏。我們想對其中三點進行補充，分別是東亞的臺灣與中國、西方的地理大發現，以及羅馬遺產的重要性。

首先是東亞。本書在提到東亞的語言單一時，並未考慮到臺灣南島語族的語言多樣性。此外，作者在分析中國的大一統時，也沒有考慮到科舉制度的重要性。誠如賈瑞雪與白營發表在頂尖經濟學期刊的研究〈精英選拔和政治穩定〉(Elite Recruitmen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所示，科舉制度正是穩定中華帝國的重要機制，晚清廢科舉，反倒促成了推翻清朝的革命。另外，作者在分析大一統的關鍵時，強調了「北燕—拓拔—隋唐」這樣的歷史脈絡，卻略過了曹魏。然而三國能否統一，無疑是對「大一統帝國」信念的壓力測試。一方面，曹魏之時，北方草原民族早已南遷，從江統的《徙戎論》來看，許多「胡人」實際上是被曹魏政府鼓勵遷入塞內，並與漢人雜居。光從這一點來看，便跟歐洲不受官方控制的「日耳曼大遷徙」極為不同。最終要等到西晉發生「八王之亂」後，北方官僚集團對地方失去控制，才發生了「五胡亂華」。另一方面，如果曹魏當年沒有強力統一北方，那麼在東漢末年後群雄並起、北方「各族」亦從容南下建立政權的情況下，中國會不會就此裂解而無法再次「分久必合」？這也是一個未見於書中，但相當有趣的反事實思考。

至於在地理大發現方面，本書認為伊比利半島往非洲擴張，是出於鄂圖曼土耳其在一四五三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後阻隔了東西方貿易，然而經濟史研究早已否定了這項說法。早在一九一五年時，歷史學家利比爾(Albert Howe Lybyer)便已經藉由〈鄂圖曼土耳其語東方貿易航線〉(The Ottoman Turks and the Routes of Oriental Trade)一文質疑這項傳統觀點。經濟史家連恩(Frederic c. Lane)在一九七三年的文章

〈達伽馬前的香料價格〉(Pepper Prices Before Da Gama)也發現威尼斯的香料名目價格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前後並沒有改變。二〇〇九年，奧弗克(O'Rourke)與威廉姆森(Williamson)兩位學者的文章〈達伽馬對歐洲市場有影響嗎？〉(Did Vasco da Gama Matter for European Markets?)更是確立了兩件事：第一，一四五〇年代的香料供應並未隨著君士坦丁堡陷落而中斷，實際上鄂圖曼與威尼斯的貿易路線仍然持續。第二，調整物價因素後，一四五〇年代的香料價格的確上漲，但這反應的是長期連續的上漲趨勢。因此西班牙、葡萄牙的海外擴張其實是為了尋找媲美鄂圖曼與威尼斯香料貿易的新貿易網絡。換句話說，在威尼斯與鄂圖曼長期進行貿易合作下，伊比利半島的政權其實是為了要跟義大利政權競爭才會另闢新航路，這反倒與《大逃離》作者主張的去中心化競爭一致。

不僅如此，本書作者在詮釋地理大發現時，也忽略了伊比利半島政權往非洲的擴張，其實更早於英明君王的政策。近年來的研究，如彼得·馬克(Peter Mark)與奧爾塔(José da Silva Horta)二〇一一年出版的《被遺忘的離散》(The Forgotten Diaspora)，便指出猶太人被從伊比利半島上驅逐後，許多人(特別是猶太商人)便跑到西非發展，這些人因此被稱作「流亡者」(Langados)。布魯克斯(George E. Brooks)也在《地主與異客》(Landlords and Strangers)與《在西非的歐非人》(Eurafricans in Western Africa)等書中進一步說明，這些伊比利流亡者到了西非後如何受到西非習俗的影響。他們會跟當地的非洲部落公主聯姻，形成「葡萄牙—非洲」的貿易網絡，而他們的後代在世界貿易史扮演了重大角色。這些既有的非洲商業網絡，則是導致西、葡兩國地理大發現擴張的關鍵。地理大發現的新研究近年甚多，作者雖然花了不少篇幅談了這方面的議題，卻未談到這些新文獻，實在可惜。

最後，則是對羅馬史的補充。作者認為羅馬帝國的「遺產」不如羅馬帝國的「消失本身」重要，甚至在本書結尾時還懷疑「羅馬帝國的存在對歐洲的現代性是否有貢獻」。但愛德華·沃茲(Edward

Watts)等羅馬史學者便曾指出，羅馬全盛時期的文化制度對歐洲西部行省有著深遠的影響。也就是說，「西歐」作為一個整體，其實是羅馬帝國創造出來的概念。近年來的經濟學研究也進一步指出，羅馬當年打造的交通網絡對今日歐洲的經貿整合有著非常巨大的貢獻，這點可參見弗呂克格爾(Matthias Fückiger)等人即將發表於《經濟研究評論》(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的文章〈羅馬交通網絡與經濟整合〉(Roman Transport Network Connectivity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因此說到底，羅馬的「興起」與「消失」，或許各自都對歐洲有著巨大影響。

## 《大逃離》給臺灣讀者的啟示

臺灣讀者能從本書獲得什麼收穫呢？首先，自然是對羅馬及中古歐洲的各類史實有更系統性、更深入的認識。希望這篇文章的介紹能讓讀者對反事實推論的來龍去脈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並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更能與作者的思路對話。或許在讀完之後，讀者也可以問自己以下幾個問題：如果當初《馬關條約》割讓的是大連而不是臺灣，或者是二戰之後臺灣被美國託管乃至繼續當日本領土，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會跟現在有什麼不同？若蔣經國當初沒有解除戒嚴，或是選擇了林洋港而非李登輝擔任副手，臺灣的民主會不會有不同的面貌？

這些思想實驗的重點不在於最後得出什麼結果，而是將我們理解歷史的目光，從少數幾位重要人物的決策與想法上移開，重新反思歷史事件的社會文化背景與自然環境。如此一來，我們就能更加理解當時人們決策時所面對的限制及影響，也就不會武斷地說出「要是沒有某某人的高瞻遠矚，就不會有後來的臺灣經濟發展或民主成就」。握有大權的領導者確實會影響歷史的走向，但歷史的走向不必然只由領導者的決策決定，還同時受到當時時空環境的左右。如果不想讓偶發事件或錯誤決策主宰我們的命運，唯一的方法就是將制度耕耘得更加厚實，把社會打造得更加韌性。這種以史為鑑，才能照出更寬廣的可能性。